

# 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新机遇

——在“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高级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宇明

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高级专家研讨会,今天在暨南大学召开。我代表会议主办单位之一的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向与会的各位专家表示感谢。

今天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和语言学的人,大约都很羡慕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当时,语言学界的很多事情,毛主席、周总理等高级领导都曾亲自过问。《人民日报》专门发表语言问题的社论,还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在那十几年中,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语言工程,如轰轰烈烈的全国语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召开了第一次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会议,制定了普通话的标准并向全国推行;汉字整理和简化,审定、发布拼音方案等等。那是中国语言文字工作、中国语言学的辉煌的年代。

自此以后,语言文字工作和语言学也有不少进展,但却很难达到五六十年代的辉煌。时至今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语言学似乎门庭冷落,甚至被“边缘化”了。在学科群中,似乎没有几个学科了解中国语言学的情况,甚至连了解的欲望也没有。比如文学研究界,他们是语言学的近邻,在大的学科系统中两家还同属一个大学科。文学研究界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等,曾经很感兴趣,但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不怎么感兴趣。随着教育的发展和传媒的普及,一些高深的科学知识逐渐成为社会常识,而社会的语言学常识却在极度下降,甚至下降到了无法再下降的地步。中国有多少种方言?有多少种语言?语言和人有什么关系?语言和国家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不必问寻常百姓,去问那些学界、政界、商界的精英们,看看有多少人能回答?这就是中国语言学的生存环境!

尽管如此,但仍能使人预感到,中国语言学的新的发展机遇正在到来。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这种发展机遇:

## 一、信息化

20 世纪末,人类由工业化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国家信息化的基础是语言文字信息化,没有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国家信息化就不可能实现。人类信息的 80% 是由语言文字负载的,如果不能将这 80% 的信息载体信息化,国家的信息化肯定无从实现。从信息化的角度来看语言文字研究,来看语言文字工作,来看语言生活,当会有许多新启示。语言的信息地位决定了语言文字信息化一定会被提到国家的日程上,信息化的发展一定会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一位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院士曾讲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较好的高新产业,有许多都是与处理语言文字相关的,如北大方正、四通、联想、科大讯飞等公司。许多致力于信息技术的外国公司,如微软、IBM、因特、摩托罗拉、富士通等,纷纷在中国设立研究院,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这便是信息化给语言学带来发展机遇的征兆。

几十年来,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些先行者,已在努力为语言文字信息化做贡献,语言文字的信息化也早被纳入到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中。但是平心而论,比起计算机、网络等专业来,语

言学界为信息化投入的人力、精力远远不够, 自觉意识远远不够。应当认识到, 语言学界如果不能成为语言文字信息化的中坚力量, 就可能被信息化给“边缘化”。

## 二、汉语的国际传播

中国正昂首阔步地走向世界。国家走向世界, 她的语言一定要走向世界。国家成为强国, 也要求她的语言成为强势语言。在中国走向世界、发展强大的过程中, 语言学一定是大有作为的。几十年来, 我们关注较多的是国内语言问题, 今天还应关注海外华语和汉语的国际传播问题, 还应研究, 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应采取什么样的语言方略, 应当预测中国走向世界之后, 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汉语该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 还不能为国家决策提供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在考虑汉语的国际传播时, 必须正确对待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在新的形势下, 看来仅有普通话(或者“国语”、“国家通用语言”)的概念是不够的, 它不能涵容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应该在语言规划层面有一个新概念——华语。华语, 可以定义为“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海外华语的地位很重要, 可以概括为三: 1. 海外华语, 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不能轻视更不能放弃。2. 普通话在近几十年的发展, 向海外华语吸收了不少词汇, 海外华语为普通话的发展做出了并将做出重要贡献。3. 海外华语是汉语走向世界的“先遣队”,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全世界的华人应当团结起来, 全世界的华语也应当沟通起来。中国走向世界, 汉语向国际传播, 一定会带来语言学的新发展, 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快速成长便是佐证。

## 三、语言矛盾凸现

中国过去是“单言单语”社会。一百多年来, 随着教育的发展, 早期的国语运动和后来的推广普通话运动的开展, 中国语言社会正由“单言单语”过渡到“多言多语”(包括“双语双语”)。会讲两种方言(即从小熟悉的方言以及后来获得的“高级方言”——普通话)的人已经达到50%左右, 能讲双语的也大有人在。许多少数民族成员兼通母语和汉语, 这种双语多是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 而兼通母语和外语的双语人, 则一般是通过教育形成的。“多言多语”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是应当提倡的语言生活。我国虽然在语言政策层面没有明确提出“多言多语”社会的概念, 但是推广普通话和鼓励外语教育的一系列努力, 事实上就是要打破“单言单语”社会, 建立“多言多语”社会。

在由“单言单语”社会走向“多言多语”社会的进程中, 语言问题变得非常明显, 语言矛盾也逐渐显现。

(一)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矛盾。普通话与方言的矛盾, 在学术层面早有讨论, 近年来开始进入政治层面。南方有一两个城市, 在政协会议或人大会议上有人提出保护当地方言的问题。香港实行“两文三语”, 在中文教育领域, 教学语言是使用普通话还是粤方言, 争论频仍。在台湾, 国语受到压制, 河洛话(台湾的闽南方言)地位骤升, 这也是普通话(国语)与方言的矛盾的表现, 当然这种矛盾的成因, 在台湾有更深的政治背景。

普通话的推广非常必要。中国要形成统一的市场, 语言必须统一;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 语言必须统一; 中国要走向世界, 语言也必须统一。西方国家在实现语言统一的过程中, 即使是号称非常民主、非常文明的国家, 也没有科学地处理好标准语与方言的关系, 致使其方言灭亡或濒临灭亡。当然在语言统一的过程中, 有许多发达国家也没有处理好主体民族的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 致使其少数民族语言濒临灭亡, 甚至还对土著语言故意打压, 导致土著语言大量消亡。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 我们在语言统一的过程中, 能否避免西

方一些发达国家所走的弯路?我国方言缤纷多彩,所说的汉文化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方言来负载的,如地方戏曲、歌谣、民间故事传说等等。如果没有异彩纷呈的方言文化,汉文化将会非常贫乏。方言及其所负载的文化必须保护,为了语言沟通又必须推广普通话,这需要语言学家研究出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给国家提供学术建议。

(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濒危。过去,异族统治、强迫同化是语言消亡的主导因素,如在日本五十年的统治下,台湾岛上的汉语几乎消失。现在语言消亡的原因很多都不是强迫同化,而是自愿放弃。一个民族如果自愿放弃自己的语言,只要一百多年的时间,这个语言就会濒危。满语就是一个例子。在清代的康乾之时,朝廷还不断强调满族人学习国语(当时的“国语”就是满语)、使用国语。但是这种强调并没起多大作用,广大满族群众,也包括满清贵族,自愿放弃满语。时至今日能讲满语者已为数不多,若干年后(十年?)满语可能就消失了。

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很快。民族地区的孩子要走出祖居的大山,其家长热心支持孩子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外语,这是积极现象。但同时也有一些家长,认识不到孩子掌握母语的重要性,对孩子的母语学习不热心,甚至不支持。国家鼓励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怎样把这项政策落到实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信息化也是导致语言濒危的重要因素。一些不能用计算机处理的语言,不能进入因特网或不能在网络中发挥作用的语言,势必厄运当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众多,有许多语言还是只有口语没有文字。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如果不能实现信息化,将会出现大面积的濒危乃至消亡。

过去人们常说语言是工具,是交际的工具;或者说语言是问题,因为语言和方言的分歧影响沟通,所以要推广民族共同语和族际语,以解决语言问题。现在则要提出一种新的观念——语言是资源,而且是国家资源。语言资源有时能再生,有时它还真是不能再生。只要有人学它用它就能再生,没人学它用它就不能再生了。语言濒危,也就是资源濒危,保护濒危语言,也就是保护国家的濒危的资源。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自然会带动语言学的发展。

(三)母语和外语的冲突。中国走向世界,必须要与世界交往,要学习世界上的先进东西,就必须加强外语教育。但是外语教育不应构成对母语的侵犯。理论上说,母语发展同外语教育可以是相辅相成的,不必是对立冲突的。母语是根,外语是用,不能为“根”而不去“用”,更不能为“用”而损了“根”。

当前语言生活的实际状况是,外语侵占了母语的大片的精神家园,母语的地位和威望在大幅度下降。例如,在我国晋级、晋职、升学、就业等许多领域,存在着重外语轻母语的政策规定。有些中小学大力试验推行的“双语教学”,其目的是改善外语教育,而似乎对母语教育考虑较少。在中国召开的一些学术会议,会议语言有不选用汉语甚至不准用汉语的。筹备在我国举行的国际体育盛会和博览会时,有外语服务和推广方略,而往往缺乏利用大会宣传汉语、推广汉语的筹划。许多城市的地名标牌,要求加上英文,以为这样才是“国际化”,殊不知地名标牌是国家主权的象征。这些现象说明,外语和母语的矛盾已经相当激烈,致使一些名人和“愤青”,在报刊和网络上说了许多让人鼻子发酸、眼圈发热的话:“汉语,我为你哭泣!”“谁来保护母语?”

是的,母语不仅是民族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思维的最为重要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和社会凝聚团结的“图腾”。爱我中华,亦爱我语言;热爱社会生活,也包括热爱当今的语言生活。通过热爱母语的教育,来培养爱国家、爱民族、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世界上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曾放声讴歌他们的母语,我们也应纵情讴歌我们的母语,维护母语的声望,提高母

语的地位,促进母语的国内推广和国际传播。

一些高层面的语言问题,从来都涉及国家的政治和政策。很多国家,因为语言的问题而造成动荡,乃至分裂与战争。如加拿大的双语问题,早年东巴基斯坦(今天的孟加拉国)和西巴基斯坦的语言斗争,前苏联解体前后的语言纠纷以及延绵至今的语言冲突(其中也有语言战争),都说明语言问题的严重性。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在国际一体化、文化多元化、语言多元化的背景下,要认真研究当前社会的各种语言问题,有必要对各种语言的功能与地位进行再审视、再规划,以保证我国的语言生活健康、和谐且充满活力。

以上所谈的这些因素,必将促成语言学发展的新机遇。抓着机遇,顺应形势,首要的是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很多大手笔共同著述,这次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高级专家研讨会的召开,可以看作这篇大文章的绪论。此时此地,我最想说的是如下两点:

第一,加强领域语言研究。应用语言学最大的特点,是研究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交际中的活的语言,在研究这种“活语言”时,必须充分考虑语境,必须充分考虑使用语言的人。因此,社会各个领域的语言问题和语言状况,都是应用语言学最为关心的研究课题。某个领域的语言研究有了大的收获,便会形成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语言教学、计算语言学便是这样的分支学科。在我国,法律、广告、新闻、医疗等领域的语言研究已渐成气候,法律语言学、新闻语言学、广告语言学、医疗语言学等,作为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发展领域语言学,就要知道各领域有什么样的语言问题。2004年12月上旬,教育部、国家语委对天津市的语言文字状况进行评估,我有幸参与其事,亲身感受到铁路、文化、商场、展览馆、医院等行业或部门,都有关乎其工作质量的语言问题。例如天津市一家肝胆专科医院,办得很不错,医院对语言文字工作也特别重视。医生们反映,一些医疗常用字,笔画太多,如“餐、葡萄糖”等。医生一天要手写许多病历,一笔一划写这些字太困难了。还有读音问题,如“妊娠”,全社会几乎都读 renchen,若读它的正确音 renshen,病人反倒听不明白。这次评估使我认识到,领域语言学非常值得提倡,社会的各领域都有一些语言问题,需要语言学家去帮助解决。研究和解决社会各领域的语言问题,应成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内容。

研究社会各领域的语言问题,我们的知识结构就有不足,必须和各领域的学者联合。因此,培养语言学研究生,不能只要求语言学的知识背景,还应该其他的学科背景,所以学科建设不一定要“纯而又纯”,应用语言学也许需要“杂家”。应用语言学课程体系的设计,研究生的培养,以及科研机构的设置等等,都应当考虑领域语言学的“杂”的特点。

第二,适应信息化时代。在信息化时代,语言学家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之一,当然是促进语言文字的信息化。语言文字的信息化,不仅仅是文字、语音、语汇、语法的信息化,更重要的是语义、语用的信息化,是实现计算机的篇章理解。例如,网上电子文本的计算机学习及信息提取,信息检索与信息过滤等等。为信息化服务,要求语言学家必须能够同计算机学家、网络学家对话。对话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需要共同的意愿和一定的共有知识,为了对话,语言学家必须学习一些计算机知识和网络知识。

利用信息化成果进行语言学研究,也是语言学适应信息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语言学到了改变传统研究方式的时候了。现在很多研究生写论文,都要利用语料库或是自己建立语料库,这说明研究手段的变化已经是许多人感受到的需求了。

未来的语言学家,大约需要用“三大法宝”来装备自己:一是知识库,该领域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通过数字化形成该领域的知识库。二是与各个专业相关的语料库, (下转76页)

的意思。”再如 K 有一次给姥姥通电话(36 个月),突然停电了, K 立即对姥姥说“电话没电了,再见吧。”有时,儿童在使用语素相加策略时会受到挫折,他们便自觉调理解角度,转而使用语义偏指策略。例如:在“陌生词理解实验”中, K 对“地图”的解释是“地图就是在地上画画儿”,当成人给她出示了画册上的《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后, K 又有了新说法:“地图就是画儿。”

探讨低龄儿童(0—3 岁)词义理解的策略必然会给早期教育带来很大启发。生活中,成人常常低估甚至忽略儿童的语言潜力。正确的做法是:把儿童当成一个重要的交际对象(哪怕他只有几天),与之平等地交流;注重言语输入的技巧和质量,在输入的频率、深度、规范性、目的性和趣味性上多下工夫;认真对待儿童言语失误现象,最好能找出根源,及时纠错,逐步缩小与目标语的差距。

\* 本文写作获安徽省教育厅青年项目“儿童语言行为研究”(项目号 2003Jqw47)的资助。

#### 注释:

① 参见魏锦虹《试论 0—3 岁儿童词义理解的几个阶段》(《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 4)

② K, 女, 1998 年 5 月出生, 本课题个案研究对象。

③ 参见魏锦虹《0—3 岁儿童心理词库的建立与发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 4)

#### 参考文献:

- 贾彦德, 1999, 《汉语语义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靳洪刚, 1997, 《语言获得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孔令达、王祥荣, 2002, 《儿童语言中方位词的习得及

相关问题》, 《中国语文》第 2 期。

李 丹, 1994, 《儿童发展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公翔, 1993, 《现代儿童心理语言学》, 河北教育出版社。

李宇明, 1995, 《儿童语言的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宇明、陈前瑞, 1999, 《语言的理解与发生——儿童问句系统的理解与发生的比较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宇明、唐志东, 1992, 《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欧阳俊林, 1999, 《儿童语义习得与认知发展研究述略》, 《语言文字应用》第 2 期。

庞丽娟、李 辉, 1997, 《婴儿心理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彭聃龄, 1996, 《语言心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天敏、许政援, 1979, 《初生到三岁儿童言语发展记录的初步分析》, 《心理学报》第 2 期。

徐彩华、李 镔, 2001, 《语义透明度影响儿童词汇学习的实验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第 1 期。

徐政援、郭小朝, 1992, 《11—14 个月儿童的语言获得——成人的语言教授和儿童的模仿》, 《心理学报》第 2 期。

云桂宾, 1999, 《语言行为和语言技能》,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赵元任, 1953, 《语言的意义及其获取》, 李芸、王强军译, 《中国语文》2001 年第 4 期。

周国光, 1998, 《汉语句法结构习得研究》, 安徽大学出版社。

朱曼殊, 1987, 《儿童语言发展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上接第 4 页)语料库是语言经验的延伸,将成为发掘语言事实和语言知识的最重要的宝库。三是一套便于语言学家使用知识库、语料库以及从事相关研究的软件,这套软件可以让语言学家去做高深的、机器不能代替的研究,而不是把精力耗费在一个一个数据的查找和统计上。当代语言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打造这“三件法宝”,促进语言研究手段的现代化。

语言信息化和语言研究手段的信息化,就某种意义而言,是年轻人的事业。要注意培养年轻人,不可把学生看作自己研究的简单翻版,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欣赏他们的创造力。年轻的学者,应自觉承担起历史重任,把握着即将到来的学术机遇,把我国的应用语言学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